◆观 点

不良称谓反映出的大问题

称谓中的问题，本质上是对整个社会名实关系尚未完全确定的反映，但具体到不同的领域，又有不同的表现。

官场上直呼“老板”“老大”的现象已经有好些年。如果说最开始这么称唤，只是暂时填补旧称谓的“空白”，那么到了今天，长期使用下来，官场内部也就习惯了，渐渐地，听的人觉得开心、舒服，叫的人朗朗上口，觉察不出什么问题。可跳出官场来看，这些称呼有没有问题呢，普通人会不会听着反感？答案一目了然。

在古代，有种“当官做老爷”的说法。所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做了官就在民之上，大权在握、享受富贵，无异于做“老爷”。但在封建时代，“老爷”其实又是名正言顺的说法。这种高高在上的称谓，反映了礼制等级秩序下的身份，官员身份天然高于百姓，人人也觉得合理，“青天大老爷”甚至是一种美称。尽管“老爷”的说法已经不合今天的价值取向，但放在那样一个封建专制的背景下，它是名实相副的，合乎当时的政治秩序，是被全社会认可和接受的。

今天，“官老爷”是叫不得了。现代权力制度规范和现代政治的内在要求下，当官是人民公仆，以前我们喊同志，西方喊先生、阁下、首长，无论多么尊敬有加，也是平等的叫法。孔子说“必也正乎名也”，因为名称往往对应着一种秩序、规范，现代政治自然就有现代的称谓。今天一些地方“老板”“老大”的称谓开始流行，表面上是往“官老爷”的说法倒退，其实是隐含了一种政治脱序的现象——他们之间是上下级关系、同志关系还是江湖关系呢？这所隐喻的，又是权力结构关系的灰色化倾向，比“官老爷”更败坏。

另外，“老板”“老大”进入官场本身，也不是为了确切地界定行政系统内部关系。会出现这些称谓，是原有称谓逐渐淡化后，找不到对称、替代的叫法，于是向其他行业、领域“借用”称谓。为什么出现这种“借用”？为什么会称领导为“老板”“老大”，而不是“阁下”“先生”“首长”？如果权力不受约束，或者说权力在很大程度上没有受到有效的约束，伸缩性极大，自由度极高，那么权力的身份也就将模糊化、复杂化，如一些官员游走在政商两界，八面玲珑，到处通吃，手中的权力与其他因素结盟，他们自然变成了“老板”“老大”，意味着利益分配的核心人物，早已从现代政治的轨道中脱离出来。

最常见的，是权力与金钱、暴力的结合。为什么“国考热”会持续多年，为什么“权力通吃论”不可置疑？这些社会现象所反映的基本现实就是，我们仍处在一个“权力至上”的社会。一个人做了官有了权，就等于有了钱，有了说一不二的实力。之所以称“老板”，因为权力可以迅速勾兑资本；之所以称“老大”，因为绝对的权力需要的是绝对的服从，必要的时候，甚至不惜用江湖上的拳头、暴力，以恐惧威胁实现这种服从。进一步而言，“老板”“老大”有其存在的土壤，它们同时指向了权力背后政治伦理不检点的大问题。

由此来看，“老板”“老大”不仅是风气问题，其根本问题远比当官做老爷严重，而我们也必须及早认识到这一点，检讨作为政治文明基础的政治伦理问题。（2014年5月22日《长江日报》付小为）

反腐词典中不该有“冷衙门”概念

一笔扶贫款从市到县被侵吞40%，从县到乡又被克扣40%；一张小农机具秧盘的国家补贴2毛5分，农技站就克扣1毛8分，站长还要贪3分……据新华社报道，近年来，随着一些官员因贪腐落马，这类“冷”门“热”贪现象不断涌现。

在不少人看来，扶贫办、农技站等，就是典型的“清水衙门”。可连3分钱都不放过的乱象，却让不少人大跌眼镜，这种“蚊子腹内刳脂油”的做法，真算得上是“勿以款小而不贪”。但真别小看这“抠得很”的贪腐行为，所谓集腋成裘，它若积少成多，照样会挖公共财政、政府公信的“墙脚”。从性质上讲，这也是不折不扣的违法行为，从行为后果看，它同样侵犯了民众利益。

实质上，腐败向“清水衙门”蔓延，也表明“清水”不清，照样有油水可捞。应看到，近些年来国家政策向民生领域倾斜，加大了民生投入力度，这也使得一些“冷衙门”变成香饽饽，说其“清水”只是伪命题。而只要是有油水，而对应的监督制衡又没跟上，它就难免被侵蚀。这也是“权力腐化”的常见规律。

没错，比起“炙手可热”的能源领域等，作为“清水衙门”的农科站等出来的“蝇腐”，确实在眼球冲击力上“逊爆了”。但蚁蛀同样不可小觑：所谓“鱼有鱼道，虾有虾道”，若只将反腐之手伸向肥得流油的部门，而忽略了这些“冷”门，恐怕会养痈成患。这就需要反腐不分部门、不留死角，“抓大放小”本质上还是留下反腐盲区。

而监督不留死角，也需要在完善相关审批、验收、审计等监管制度之余，实现源头预防的零遗漏，实现反腐制度设计的立体化。不仅要自内而外，由党纪、法规筑起反腐围墙，还要由外而内，形成多元互动监督格局，打破“灯下黑”反腐困境。不管是部门一把手，还是小到发放补贴之类执行端的公职人员，都要被收束到强效约束下。试想，若实现对相关财政资金的“毫厘必争”式监管，公开财政补贴的明细账，“3分钱的腐败”能逃脱法眼？

在反腐语境下，就不该有什么“冷热衙门”之分，也只有360°无死角的反腐格局，才能构筑起低容忍的反腐围栏，让大小官员才不敢越贪腐雷池。这时候，“冷”门“热”贪自然也没了生存土壤。（2014年5月22日《新京报》顾昀）

分配改革应有利于改善阶层结构

最近，国务院批复同意建立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牵头的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部际联席会议制度。联席会议由中央编办、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21个部门和单位组成。这些部门将在国务院领导下，统筹协调做好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各项工作。

某种意义上，制度的调整和变革，有助于打破既定利益结构，以及整治官僚系统的懈怠无为。收入分配改革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议题，应是一种“国家战略”。“联席会议”能否发挥“撬动”的作用，可以保持期待。

人们注意到，在今年两会期间，有关方面已经表态要给公务员加工资，也许这一加薪的方案正在酝酿或制订之中。还有另一类人，即事业单位职工，这是一个拥有3153万人的庞大群体。2014年7月1日，《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将正式施行，其第33条是：“国家建立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工资的正常增长机制。”这两个群体，都是或很大程度上是由财政供养。

但并不接近体制、制度地位较低、市场地位也不高的人呢，比如公司职员、工厂员工、出租车司机、服务业人员、环卫工、农民，他们呢？收入分配改革，恰恰就是要提高这些体制外主要依赖于市场为生，没有多少博弈能力的人群的收入。有什么办法可以保证他们能够有工资的正常增长机制？

在这里，我们发现了收入分配改革所牵涉的面的复杂，以及它的困难程度。依赖于市场获取收入的人，提高他们的收入，不可能是用财政的钱给他们涨工资，也不可能硬性规定市场、企业必须给他们涨工资。说到底，他们的工资增长，是一个经济发展的问题，是一个通过博弈能力，以便从企业利润中分到更多蛋糕的问题。

就此而言，“收入分配改革”指向的，并不仅仅，或不应仅仅是收入本身，而是要改变当前中国社会的阶层结构，抑制富人群体在财富和资源的社会占有上的扩张并强化二次分配，防止中产阶层“下层化”，并把更多低收入的人提升到中产阶层。

按照社会分层的理论，某个人属于哪一个阶层，包含有权力、生产资料、收入、职业、在市场中的地位、社会资本、人力资本、文化资本、声望、影响力等综合指标。

很清楚，制度地位或（和）市场地位越高的人，阶层地位越高，收入一般也越高。收入分配改革，要改变当前中国的阶层结构，目光当超越“收入”这一范畴，而放在从政治、经济、社会等层面，按照公平原则尽力缩小各群体的制度地位，以及提高体制外低收入群体在市场中的地位上。（2014年第11期《南风窗》石勇）

◆史海钩沉

毛泽东在香港问题上的战略远见

毛泽东是新中国的缔造者，但许多人不知道，他也是保持香港繁荣稳定的最早决策者。我们不妨回顾一下历史。

1949年10月，解放军解放了广州，兵临深圳界河边，却停止了脚步。这是为什么？难道是害怕英国在香港的一万多名驻军？当年12月19日《香港华侨报》头版头条的报道揭出了其中的秘密：“毛泽东已保证香港地位安全，英国年内承认中共。”

作为20世纪最伟大的政治家之一，毛泽东生前虽未亲自踏上香港这片土地，但却长期关注香港问题，重视香港，并为香港回归作好了战略和政治外交方面的准备。

解放军不打香港并非是到解放广州时才临时决定的，毛泽东对此问题早有考虑。

早在1946年12月，毛泽东就对来访的西方记者说过，对香港“我们现在不提出立即归还的要求，中国那么大，许多地方都没有管理好，先急于要这块小地方干吗？将来可按协商办法解决”。

1949年年初，全国大局将定，毛泽东与斯大林代表米高扬谈话时说：“中国还有一半的领土尚未解放。大陆上的事情比较好办，把军队开去就行了，海岛上的事情就比较复杂，需要采取另一种较灵活的方式去解决，或者采用和平过渡的方式，这就要花较多的时间了。在这种情况下，急于解决香港、澳门的问题也就没有多大意义了。相反，恐怕利用这两地的原来地位，特别是香港，对我们发展海外关系、进出口贸易更为有利些。总之，要看形势的发展再作最后决定。”

其实，毛泽东早在青年时代就形成了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要从世界看中国的观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冷战格局中，毛泽东意识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会极力阻止中共上台执政，一旦中共执政，它们就会对中国实行封锁禁运。而香港作为英国在远东政治经济势力范围的象征，暂时留在英国人手里，比立即收回显然更加有利些。因为英美之间、美欧之间在对华政策上存在矛盾，英国为了保护自己在远东的利益，就不能完全跟着美国走，来封锁中国。相反，为了维护香港的稳定和发展，必须同中国保持较好关系。

毛泽东看到，香港是英国在远东政治经济势力范围的象征。在这个范围内，美国和英国在对华政策上也就存有矛盾。中国把香港留在英国人手上比收回来好，在这种情况下，香港对我们大有好处，大有用处。就这样，香港成了新中国发展对外关系的瞭望塔、气象台和桥头堡，通往东南亚、亚非拉和西方世界的跳板。

当时，毛泽东在香港问题上所采取的上述政策，曾受到国际上一些共产党的批评。他们认为中国对帝国主义的态度过于软弱，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竟然会允许殖民统治的存在。毛泽东回应说：“至于香港，英国没有多少军事力量，我们要占领是可以的。但过去有条约关系，小部分是割让的，大部分是租借的，租期是九十九年，还有三十四年才满期。这是特殊情况，我们暂时不准备动它。香港是通商要道，如果我们现在就控制它，对世界贸易、对我们同世界的贸易关系都不利，我们暂时不准备动它。”

正是因为有毛泽东这样的战略决策，新中国成立不久，英国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第一个承认新中国，与新中国谈判建立外交关系。也正因为有毛泽东这样的战略决策，当西方国家跟随美国对中国实施封锁禁运时，中国能够通过香港这一特殊管道，进口石油化工等重要战略物资。而到中苏关系破裂，中国在陆上的进出口通道完全被封闭之时，香港更几乎成为中国与外部世界联系的唯一通道。在此期间，香港不仅对祖国内地的经济建设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功不可没，它本身也因此而获得快速发展，很快成长为“亚洲四小龙”之一。

新中国成立后，中共一直恪守“协商解决”的决策，正视英国在香港的长期统治，不干涉香港内部事务，即使在“文化大革命”的特殊时期，全国都处在极其混乱状态，香港本身也发生大规模反英“风暴”之时，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始终没有发生过任何动摇。

大家知道，为了维持香港的繁荣稳定，中共高层一直要求有关领导不能拿内地的眼光去看香港，更不能用内地的办法去干涉香港。为了保证香港同胞的福利，中央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特殊政策，以优惠价格为香港提供生活必需品、淡水和工业原料，即使在最困难的三年时期（1959—1961年）也从未中断，价格远低于国际市场。20世纪60年代初，由于天旱，香港用水紧张，存水量告急，中央政府作出决定，“香港居民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是我们自己的同胞，供水工程应由我们国家举办，列入国家计划”。结果，东江之水跨山而来，解决了香港的水荒。

曾有学者称，“香港就是这么奇怪的城市，信仰社会主义的中央政府支援它繁荣”，“北京提供了战后几十年香港社会稳定的客观条件，也给予了投资者充分的信心。……实际上，香港战后几十年的‘繁荣与稳定’环境，是北京营造的”。而北京之所以能够在香港“营造”出这样的环境，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毛泽东的远见卓识和“协商解决”的正确战略决策。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回顾这一历程，我们对毛泽东的无量功德不仅应该牢记在心，而且更应以实际行动落实之，使香港能够在“一国两制”的大框架下，真正长期保持社会安定和谐、经济发达繁荣、民生欢乐幸福。这是毛泽东在60多年前所乐见的香港，也是香港人今天所企盼的香港。（2014年第3期《党的文献》杨孙西）

◆纵 横

“美国霸权再维持一百年”能否实现

美国总统奥巴马5月28日在西点军校毕业典礼上发表演讲。按照传统，总统的正式演讲，依从于会场环境，往往代表了政府某一侧面上的政策重心。这次演讲侧重点放在反恐、从阿撒军及维持美国全球领导力等军事与安全问题，基本没谈贸易、就业增长等非军事议题。而在2012年一场放在社区大学的演讲中，奥巴马重点谈到贸易政策、制造业回归等与产业工人密切关注的问题。与2012年那场演讲时奥巴马提出“美国决不做世界老二”的口号一样，这次西点军校演讲中，奥巴马提出了类似的构想，称美国有能力维持全球领导地位“一百年”。如何解读“美国霸权再维持一百年”呢？

国际关系学者普遍认可乔治·莫德尔斯基的“霸权周期论”，莫德尔斯基是基于“霸权稳定论”的理论支持下展开阐述的。按照莫德尔斯基的理论，世界的政治与经济呈现一种长周期的特性，第一个周期由一个霸权国家所主导，大约持续一百年，如英国霸权经历了连续的两个周期。自一战结束之后，美国开始拿起了英国失落的霸权接力棒，到现在差不多经历了一个周期。这一周期中有莫德尔斯基所描述的盛衰循环，即美国在冷战时基于两极格局的受约束的全球领导力，冷战结束后差不多十来年的单极格局下的不受约束的领导力，其特点就是单边主义的兴起。然后，世界渐入多极格局，美国处理全球性问题时力不从心，在自己制造的诸多问题，如阿富汗战争、利比亚危机等中，再无挥洒自如应对的能力，驻利比亚大使命丧班加西，已经成为奥巴马第二任期外交之痛。

可以说，美国若是已经享受了世界霸权一百年的命题成立的话，今天的美国正处于这一霸权周期结束之时，而要如当年英帝国一样实现第二个周期的霸权，则要看美国是否已经准备好从当下式微的低谷中重新振奋起来。

莫德尔斯基认为，任何一个霸权周期均以世界战争而始。依此理论，美国新一周期的开始必然少不了一场没有耗费美国精力却极大削弱竞争者实力的洗牌性战争。美国的对外战略历史上一直在重商主义的汉密尔顿主义、杰斐逊的孤立主义、威尔逊的道德主义及追求绝对胜利的杰克逊主义之间摇摆，今天也如此。希拉里·克林顿提出的“巧实力外交”，本质就是一种杰斐逊主义，美国实力回缩，之前所维持的世界秩序衰落，天下大乱之势已经形成，一些试图改变现状的新兴国家，可能会趁机发动“权力转移之战”，导致更多的冲突发生，从而令新兴国家耗费掉好不容易积累起来的实力，从一个有希望成为全球领导人的身份，跌落到再无能力挑战美国霸权的失败者。

正如美国著名的现实主义学者汉斯·摩根索所言，美国全球领导力的基础就是盟国与伙伴，但其决不会允许被弱小的盟国或伙伴牵着鼻子走，宁可选择让这些跃跃欲试的盟友出去咬人，也不会在实力低潮和调整期中充当英雄好汉。

所以，我们的命题又回到这里来：奥巴马轻描淡写地说要再维持美国霸权地位一百年，说明美国已经领会到霸权周期规律，并已经为领导力的重新崛起积极准备，这对美国以外的国家意味着什么？美国虽然在全球领导者的扮演上力不从心，但对付单个国家的实力却依然绰绰有余。认清美国盛衰走势，吸取历史经验教益，是每一个新兴大国认真处理对美国关系前必须做好的功课。（2014年5月30日《南方都市报》和静钧）

◆文 坛

骑士精神

春秋时代的战争规则，其实就是中世纪欧洲的骑士精神。

欧洲骑士的行为准则是：不伤害俘虏，不攻击未披挂整齐的骑士。不攻击非战斗人员，如妇女、儿童、商人、农民、教士等。这岂不正是“宋襄公精神”？可惜的是，相当多的中国人崇拜骑士精神，却很少有人意识到它是“宋襄公主义”的欧洲版。

人们津津乐道的一个故事是子路正冠。

说的是孔子的弟子子路，在战争中阵亡，临死前还不忘系好被对手砍断的帽缨，正冠而死。重视仪表、重视细节，是一种深入骨髓的教养。子路在敌人的刀锋下系好帽缨，体现了在死亡面前的从容不迫。

西方社会也能找到相同的例子。法国大革命高峰的时候，路易十六和皇后都被送上了断头台。皇后上断头台的那一刻，不小心踩到了刽子手的脚，留下了在人间的最后一句话——优雅的一个道歉：“对不起，先生。”

正如这位皇后的下意识反应一样，“贵族文化”的首要特质就是优雅。子路的最后一个动作，不叫迂腐，叫教养，叫风度。

另外一个故事，今天的读者读起来可能感觉更奇怪。

鄢陵之战中，晋国将军韩厥打败了郑国的君主郑伯。郑伯乘车逃走。为韩厥驾车的驭手杜溷罗说：“赶快追。他的御者左顾右盼，心不在焉。很快就能追上。”韩厥却说：“算了吧。不能再次羞辱国君了。”他命令驭手调转车头，放过了郑伯一命。

这个故事反映了一个重要信条，即对对方的君主保持尊重。欧洲政治中也有类似的传统，那就是做过国王的人即使被从王位上推下来，也会受到必要的礼遇。这是骑士精神的表现之一。因此，欧洲权力斗争中的失败者鲜有被处死的例子。人们无法容忍一个国王杀掉另一个国王。他们不是不知道养虎遗患的道理，只是不愿破坏自己的骑士风度。（2014年第11期《瞭望东方周刊》张宏杰）

社址：北京市海淀区大有庄100号 邮政编码：100091 社长兼总编辑：谢春涛 常务副总编辑：钟国兴 广告部电话：62805980 62806380 发行部电话：62806227兼传真 总编室电话：62805368 62806234 电子信箱：xuexishibao@126.com
定价：全年180元 邮发代号：1—267 国外发行代号：W3970 开户银行：建行北京中关村分行 户名：中共中央党校报刊社 账号：2613000456 广告经营许可证号：京海工商广字0301号 承印：人民日报社印刷厂